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16.05.001

从目的论看林纾翻译的书名

林农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〇三所, 北京 100854)

摘要: 从目的论的角度, 分析探讨了林纾翻译的书名。文章论述了林纾翻译的目的论及其翻译的书名所具有的中国文化艺术特征, 分析了林纾翻译的社会价值和现代意义, 肯定了林纾另拟新名的翻译策略, 认为林纾翻译的书名是满足目的论的国语化需求, 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 目的论; 林纾; 翻译

中图分类号: I210.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6)05-0409-05

Book titles of Lin Shu's translation in view of skopos theory (Skopostheorie)

Lin Nong

(No.203 Institute, No.2 Institution, China's Aeronautic Scientific Industry Group Co., Beijing 100854, China)

Abstract: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book titles of Lin Shu's translation in view of skopos theory (Skopostheorie), we expound his translation's purposes and the Chinese artistic features in his translated book titles. We also discuss the social value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of his translation along with his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naming new titles for his translated work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book titles of Lin Shu's translation are created to meet the purpose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localization, which is a concrete embodiment of his patriotic thought.

Keywords: skopos theory (Skopostheorie); book title; Lin Shu; translation

引言

书名作为书的重要部分,既是书的灵魂,也是书中内容的高度提炼,同时更是全书主题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书名翻译中,书名的确立是一种很强的目的性行为。翻译书名要考虑本国的语境,这样不仅吸引了读者的眼球,而且能让一本好书享有永久的美名。通常情况下,书名以简洁明了的形式,根据书中所包含的内容与信息,言简意赅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好的书名翻译既要准确表达作品的内容,领会和把握原作者的描写意图,做到题文相符,又要展现出原作的基本格调和语言风格,兼顾音韵音节,以及原作的时代感和民族文化特色等,它不仅诠释了全书的重点内容,而且还发

挥着吸引读者注意力的作用。好的书名翻译能够切中读者心里期待,要有新意、要有趣、有吸引力和有文化底蕴,不能呆板和媚俗。书名翻译新颖独特,读者自然会爱不释手。将书名的翻译巧妙地融入本国语境,就容易让接受的人体味其中深邃的意蕴。成功地翻译好书名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同样的一本书,对于书名,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翻译版本,将原语书名很好地翻译成译语书名绝非易事,翻译书名更具有挑战性。

如同小说翻译一样,书名的翻译也是一项重要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书名的翻译不仅要忠实于作者原意,还要讲究修辞及客观性。好的译名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能够使译作锦上添花,

收稿日期: 2016-07-26

作者简介: 林农(1962-),男,福建福州人,高级工程师,(林纾曾孙),研究方向:林纾生平及林纾文化。

使观众欣欣然先睹为快;同时译名本身也给人以美的感受,好的译名能广为流传,甚至深深影响年轻一代的言辞。综观古今的外国书名,经过翻译家的妙手,也是脍炙人口,有口皆碑,如《茶花女》和《飘》等。林纾为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传播到中国做出伟大而卓越的贡献,他不会外文却靠口译者转述而译出绝美文字,是中西文化的密切沟通者,他译介的西方文学,客观上为中国现代文学培养了一代巨匠。他自觉地传播西方先进的文明教化,启迪民智,不仅为中国译界带来了新局面,更为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精神助力。他的翻译小说宣扬了爱国精神、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思想和自由平等观。他的翻译作品为当时的中国人打开一扇接受“西风欧雨”的窗口,由此也成就了他“译介西方文学第一人”的地位。

一、林纾翻译的目的论

目的论把翻译的目的性摆在首位,而目的论把翻译活动置于人类行为理论的研究范围是具有明确目的和意图的行为。目的论强调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手段,译者要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发挥主动性,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法。翻译是在译者的协调下,以原文文本为起点、以译文读者为目标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书名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其目的在于尽最大可能吸引读者,打动潜在的读者,这是书名翻译的首要目的。

中国传统翻译史发展到清末,出现了以严复和林纾为代表的两位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们在该时期所开创的新的翻译模式对于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活动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翻译者对翻译(尤其文学翻译)的变异性 and 再创造是觉悟很早的,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质早已成为中国译者的共识。近代的文学翻译是为了唤醒民众,进行社会改良。林纾等怀着“吸彼欧美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心志”的民族文化心理唤醒同胞,大都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意识和策略。林纾一生翻译了184部外国文学作品,涉及英国、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翻译小说的出现,有利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更便捷地接触西方文学,其中大量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批判社会现实的倾向,它们大多描写底层的社会生活状况,直面广大民众,针砭社会时弊,这对中国传统文学中才

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体裁直接提出挑战,同时也引导中国文学创作的转向,开始关注普通民众、关注社会现实。^[1]

目的论对指导书名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可以根据这一目的,在充分考虑原语文本,以及译语文化等因素的基础上,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期达到预期效果。林纾非常关注翻译的目的,为警醒和教育国人,为了让国人正视“为奴之势逼及吾种”^[2]的事实,林纾在多种译著的序言、跋和达旨中,曾屡次表达出他翻译小说最重要的目的:激发爱国之思,寄托忧思之泪。“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之盗也。”^[3]“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我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抒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4]正如他所说翻译的目的:“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大洞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天,而星火犹燭,吾不能不然之。”^[5]在对外国小说的翻译过程中,林纾为摆脱西方强势文化的不利影响,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包括书名),而是掺杂了自己对原文本(包括书名)的看法,这正是他译作的目的所在。

人们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的,目的论为译者提供了一个指导书名翻译的新的视角,翻译目的论的核心是“目的决定手段”,目的论对书名的翻译有着重要的作用。书名如同人的眼睛,是留给读者的第一印象。翻译外文书,原版书名可能不适合本国读者阅读习惯,也未必能很好地反映出书中内容,这也需要翻译者“因地制宜”地加以书名改造,使翻译的书名既不失原书名的主旨,又能吸引本土读者的眼球。由于林纾所处的社会年代与现在有着较大的差别,社会意识形态也明显不同,因此,对于书名的翻译也截然不同。书名虽然简单,但是翻译起来颇费功夫。翻译好书名,译者应全面了解书名来源及其命名特点,书名大多以剧情、背景、主题和主人公为来源,一定要了解书中的内容、背景文化等才能给出最好的译名。林纾翻译书名采用传统文学的语言形式和文体形式,使得作品具有古典韵味,这一方面是由于林纾本人的传统中国文学思维模式,另一方面是为了符合当时国人的审美习惯。

二、林纾翻译的书名

书名是整本书的灵魂,是最少的文字却包含

了最丰富的信息,是联系作者和读者的纽带。书名的翻译最注重的莫过于读者的反应。书名的翻译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译者首先要理解书的内容,让译文更符合本国的习惯,更易于被本国读者所接受。一个好的书名通常具有以下特点:简明、醒目、概括、风趣。

由于时代的不同,生活环境的不同,读者群的不同,读者的文化和欣赏习惯的不同,语言与社会文化必然形成差异;由于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两种语言表达习惯也必然存在差异。有时候,不能将外文书名简单地直译为中文书名,翻译书名必须顾及产生书名的语境。林纾对当时读者的语言审美观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为了照顾到译文读者语言审美取向,使译作能被读者接受,林纾在翻译时采用了地道的古汉语。林纾的翻译书名具有以小见大、贴近中国文化和意境美的特点,他把语境因素与书名的翻译结合起来,令人难忘,耐人寻味,使翻译的书名真正达到了“入乡随俗”。林纾的翻译小说有: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茶花女》)、美国斯托夫人《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英国狄更斯《块肉余生述》(《大卫·科波菲尔》)、英国狄更斯《贼史》(《奥立佛·退斯特》)、英国狄更斯《滑稽外史》(《尼古拉斯·尼可贝》)、英国狄更斯《冰雪因缘》(《董贝父子》)、英国查理·兰姆姐弟《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英国笛福《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记》)、英国斯威夫特《海外轩渠录》(《格列佛游记》)、英国司各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艾凡赫》)、英国哈葛德《迦茵小传》(《迦茵小传》)、西班牙塞万提斯《魔侠传》(《堂吉珂德》)、法国森彼得《离恨天》(《保尔和薇吉妮》)、法国孟德斯鸠《鱼雁抉微》(《波斯尺牍》或《波斯人信札》)、美国华盛顿欧文《拊掌录》(《见闻杂记》)和希腊伊索《伊索寓言》(《伊索寓言》)等。书名的翻译表面上处理的是单个的字、词或短语,实际上面对的却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古往今来不少翻译家都很讲究书名的艺术,林纾翻译的书名也不例外,他对自己翻译作品的命名不是信手拈来,而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思考,既表现了原著的本意,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点,才赋予它一个浑涵隽永和耐人寻味的名子。

在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中,仁、义、礼、智、信不

仅是人伦之道,而且寄托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承载了人们在维护和恪守现实社会规范中实现个体、家族乃至社会生命之绵延不绝的终极价值。孝敬父母、夫妻和睦、兄弟友爱是我国传统家庭道德的核心成分。在“仁爱孝悌”的基础上,中国人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念和理想。林纾非常重视传统孝文化,把行孝与爱国联系起来,叮嘱儿孙:“汝能心心爱国,心心为民,即属行孝于我”^[6]。这点在《林纾家书》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因此,他翻译的书名也受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成分不仅在林译小说中反复出现,有些从其翻译的书名就鲜明地反映出来,如:将狄更斯的《老古玩店》译为《孝女耐儿传》,司各德的《艾凡赫》译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雨果的《九三年》译为《双雄义死录》,哈葛德的《蒙特祖马的女儿》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等,充分体现了以“忠、孝、节、义”为本的思想。其实西方是不讲“孝”道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林纾往往把正常的亲子之爱附会成“忠”“孝”,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联系起来,林纾的目的是使译作更容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由此可见,林纾的文学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所处社会的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并尽可能地体现该社会的文化意识和意识形态。^[7]

给书起名,一般有两个要求:一是能反映书的内容、主题或意义;二是要具有形式或内涵的美感。至于起名时具体运用何种修辞方式,则是完全自由的,可以直指内容,也可以象征其某一点。给书起个好的翻译名,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翻译者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良好的道德素养,还要有很高的审美判断能力。林纾凭着自己良好的文学素养,补原作之不足,融入了译者浓浓的民族情结,使译著更加适合中国读者的欣赏口味,并以译书警醒同胞。对林纾的翻译,特别是书名的翻译,我们拿现在的观点去衡量,往往会发出疑问:“他怎么能这样翻译?”但若考虑到林纾所处的时代,他所面对的读者以及他所意欲达到的目的,我们对他的翻译的认识就可能更为全面一些,不同时代的读者所能适应的语言表达是不同的。

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书名时,有意将人名改去,使它们符合中国习惯,特别注意文字润饰,书名自然大多意译了。于是《Uncle Tom's Cabin》(《汤姆叔叔的小屋》)译为《黑奴吁天录》,《David

Copperfield》(《大卫·科波菲尔》)译为《块肉余生述》,《Ivanhoe》(《艾凡赫》)译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Don Quixote》(《唐吉柯德》)译为《魔侠传》,这样做,既形象,又生动。从这些书名的翻译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林纾在翻译时,充分考虑了我国大众的语言习惯。汉语的戏剧及小说较重视情节,因此在命名时常使用事件名。而西方受入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命名时多使用人名。在充分考虑中西小说所带有的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林纾选择带有汉语文化特色的命名方式。此外,为符合汉语受众的阅读习惯,林纾除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都尽量掩盖中西文化间的“异质性”因素。个体被转化成群体中的一员,中国人才认为有了被接受的价值。用这样的眼光再来看中国的叙事,果然便看出新的意义来了。^[8] 这些书名、自然有其直译的译名,然而,它们早已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沿袭甚久,成了非绝对标准的标准译名了。^[9]

林纾给其翻译作品精心取名,蕴含丰富的寓意,其译作多数成为畅销书,这已经成为“林译小说”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他翻译出名符其实的书名,哪怕不符合原名但受欢迎的书名,我们也可以理解。对世界名著书名的翻译,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中西方传统观念的不同,中西方读者所处环境的不同,中西方审美心理的不同,中西方宗教文化的不同,所以对世界名著翻译的书名也不同。林纾翻译的书名,也反映了他的翻译创作思想,甚至影响到今后中国几代人的思想。虽然林纾生活的时代离我们现在已经比较遥远了,但他的翻译作品,时至今日,仍具有艺术生命力。

三、林纾翻译的书名更具有的中国文化艺术特征

书名的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交流,翻译时既要遵循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更需要翻译者的灵感和严谨的态度,如此才能使译名脍炙人口,广为传诵。我们通过对林纾的翻译作品的研究,发现读者之所以喜欢“林译小说”,是因为他的翻译方式符合汉语语境下的读者的要求,并且在翻译时,他最大程度地掩盖了中西文化间所存在的异质性因素。例如:汉语的小说重视情节,因此在命名时常使用事件名,而西方受人本主

义思想的影响,在命名时多使用人名。在充分考虑中西小说所带有的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林纾选择带有汉语文化特色的命名方式,为符合汉语大众的阅读习惯,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都尽量掩盖中西文化间的“异质性”因素。^[10]

美的语言寓意隽永,令人回味无穷,在人的脑海中产生美的意象,陶冶人的情操,给人以美的享受。尤其是好的译文在内容上挑不出毛病,又使人感到质朴清新,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原文,有的译文十分精彩,甚至超越原文,令人推崇备至。“传”“录”和“记”等的小说书名在中国小说史上颇多,在清末民初小说也较为常见。林纾翻译的书名,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艺术特征。他古文功底扎实,文学底蕴深厚,积极传承中国文学的艺术风格,常选用一些具有中国文学色彩的字眼,如“传”“录”“记”“纪”“略”“遗事”“鉴”“述”等为其译作拟定的书名。在林纾翻译的184部欧美小说中,书名中用到“传”16次、“录”28次、“记”32次、“纪”4次、“略”1次、“遗事”4次、“鉴”2次、“述”1次,合计88次,占到了全部翻译作品的48%。“传”字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用得十分广泛,以引起读者的注意。现代的传记类文学作品,以载体命名者也很多,如《毛泽东传》《郑振铎传》和《张作霖传》等。林纾有意没有直译外国小说书名,而是采用中国小说较为常见的书名方式,这对于外国小说翻译的幼年时期的中国读者来说,显然更容易接受。因此,他命名的《孝女耐儿传》《爱国二童子传》和《迦茵小传》等,很快就溶入进中国读者的心中。同时,它也微妙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小说中“史、传”文学所占有的重要位置。^[11]

林纾的翻译模式,从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角度出发,努力使译文和译名最大程度地符合中文的语言传统。当时,一般翻译连作者名字都不注出,任意改换人名、地名的比比皆是。而林纾在翻译中,一般都能将作者原名列出,书中人名、地名绝不改动一音,尤显难能可贵。林纾翻译的书名,如《鲁滨逊漂流记》《伊索寓言》和《迦茵小传》至今仍在使用。^[12] 在当时被褒奖的通俗教育小说中,有“林译小说”《块肉余生述》《冰雪因缘》《孝女耐儿传》等10种。在21种获奖小说中,“林译小说”差不多占了一半,^[13] “林译小说”的书名也从此深入读者的心中。

四、结语

翻译是一种语言的创造性活动,翻译是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对话、融合、引进和改造,是文化交流的中介和桥梁。小仲马说过:“我认为只有深刻地研究过人,才能创造出人物,如同只有认真地学习了一种语言才能讲它一样。”翻译也是同样的道理,从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算起,中国百年来翻译作品已达上万种。在全部文学书籍中,翻译作品占到三分之一强。晚清以来域外文学的引入是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五四新文学的兴起,其外来动力即源于此。林纾将自己的翻译视为“畏庐实业”,即是强调自己的“桥梁”作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对艺术的经典概括。若就纯翻译的观点来看,任何人都可以举出林译小说的诸多缺陷。但它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翻译本身,而在于通过翻译开启了民智并在文化建设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书名翻译实践中,林纾既充分考虑译语语言与历史文化背景,考虑译语读者的感受,也要考虑到让其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将书名的翻译巧妙地融入语境,以便让译文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预期,从而达到最佳效果。林纾另拟新名的翻译策略是出于满足目的语文化的需求,并自始至终把读者反映摆在首位,突出主

题,它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林纾对翻译技巧的理解,更是对其与原作者、读者和市场等关系的正确处理。林纾翻译的译名,讲究简洁通俗,易于上口,寓意含蓄而过目不忘。我们赞叹林纾翻译的译名,甚至能想到林纾长时间搜肠刮肚、苦苦思索的情景。

翻译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和翻译内容的变化,规范、规则和适用的条件往往会改变。就20世纪初期而言,林纾的翻译是非常严谨的。他对原文作者、标题和目的语读者进行仔细分析,根据目的决定手段,确定翻译的方法技巧,实现翻译目的,译出了许多堪称佳译的好书名。这些书名虽片言只语,寥寥数字,却显露着作者的意图和心迹,凝聚着作者的心血,折射着宏篇巨著的主旨和精髓,寓意深长,耐人寻味,也成了“林译小说”蜚声文坛的一个因素。正因为林译小说更加适合中国读者的欣赏口味,更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加之林译的著作多数对社会起到了震撼作用,林译小说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史、文学史、翻译史上的一个专用名词了。林纾翻译的书名是满足目的论的国语化需求,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其真正意义在于通过翻译开启了民智,并在文化建设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秦春. 固守与嬗变中的近代文学教育研究[J]. 思想战线, 2013(51): 309-314.
- [2] 林纾. 黑奴吁天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跋.
- [3] 许桂亭. 雾中人[M]//林纾文选.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序.
- [4] 吴仁华. 不如归[M]//林纾读本.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序.
- [5] 林纾. 译林叙[J]. 译林, 1901(10).
- [6] 李琴.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D]. 兰州: 兰州大学, 2009: 51.
- [7] 夏晓虹, 包立民. 林纾家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8] 钱满素. 不同的眼光——说杨义的《中国叙事学》[J]. 读书, 1998(10): 149-153.
- [9] 杨永和, 汪希. 英汉翻译中“约定俗成”现象的探讨与分析[J]. 湘潭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6): 57-61.
- [10] 蒙瑞萍. 中西语言异质性及跨文化交际探究[J]. 东方企业文化, 2013(1): 137, 108.
- [11] 李庆国. 吟边燕语流余韵——林译小说书、篇名一瞥[J]. 清末小说, 2010, 33: 99-106.
- [12] 黄榕. 从林译狄更斯小说看林纾的翻译理论[J]. 科技信息, 2010(10): 39-40.
- [13] 段怀清. 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中的林纾——一种基于文学出版与传播的历史考察[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 148-154, 167.